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刊設有「書評」欄目，舉凡是近年出版的人文和社會科學著作（具公共性和現實意義尤佳），皆歡迎海內外學者撰文評論，共同推動學術交流和對話。

——編者

平台用工成本與勞動治理困境

近些年來，對平台經濟的關注聚焦於平台勞動者，尤其是外賣騎手，主要基於三個原因：一是數量龐大；二是生活嵌入度深，點外賣成為老百姓的消費習慣；三是外賣作為典型「社會性」的數字勞動樣態，挑戰了現有勞動治理機制的效力。不過，儘管關注騎手群體非常重要，但單向強調會使我們忽略平台勞動治理過程中多方利益訴求的均衡問題。

吳清軍〈平台用工的商業模式與治理困境〉（《二十一世紀》2025年4月號）一文從新的理論視角，深入分析了平台用工的成本構成及其模式特徵，為我們客觀地理解平台勞動過程及其治理創新具有重要啟示。事實上，平台本質上是數據提取裝置，它為數字經濟提

供了基礎設施。顯然，這個基礎設施的運行是需要巨大成本的。因此，OpenAI掌門人奧特曼（Samuel H. Altman）多次強調人工智能（AI）平台是「吞噬電力與芯片的超級工業系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消費者在外賣應用程式上的每一次點擊不僅僅是消費行為，更是壓力測試，對外賣平台運行及騎手勞動都是一場考驗。因此，保障平台高效運行和維持騎手勞動秩序成為平台花費大量成本進行模式創新的核心議題。

作者將平台用工成本細分為「交易成本」和「社會成本」，據此論證了平台勞動與傳統勞動在運行方式上的本質差異。作者敏銳地指出平台運營模式事實上並不「經濟」，相反其成本極其高昂。在中國，平台通過引入第三方主體，最大化地壓縮用工成本，同時也巧妙地適配於當下勞動監管政策的要求。這種用工模式雖然成功繞過了大部分的行政監管，但卻模糊甚至架空了平台的主體責任，而且其基礎設施的社會性一定會引發基層社會的衝突和矛盾。遺憾的是，現有勞動治理手段面對這種平台用工模式，存在着明顯治理失效的困境。作者認為，只有跳出平台

用工治理的思路，從用工治理轉向社會治理，才能更好地保護平台勞動者的權益，提升應對平台勞動風險的治理能力。

吳文揭示了平台用工模式是平台資本深度計算用工成本和詳細分析勞動政策後所打造的運行「盾」，因此當我們依然沿用既有勞動政策之「矛」進行監管時，就會陷入治理困境。圍繞外賣騎手產生的所謂「困在系統裏」、「算法牢籠」等現象，不過是平台運行邏輯所衍生的外顯表象，以「算法取中」為核心的算法規制應該無力解決平台勞動治理的困境。但是，作者提出將治理責任和成本外推的社會治理路徑，在實踐中恐怕依然困難重重。

王星 天津

2025.5.14

技術決定論的突破與局限

正如孫萍等在〈控制之外：平台勞動者的另類數字實踐〉（《二十一世紀》2025年4月號）一文所言，「國內勞動研究領域在過去幾年間展開了關於平台勞動與技術控制的廣泛討論」，將研究重點聚焦於算法對勞動者的控制及其影響。文章打破了當前算法控制勞動的「技術決定論」敘事方式，引入了勞動者的主體性，提出「另類數字實踐」這一核心概念，強調勞動者在算法系統之外的數字媒介使用和實踐，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信息、知識和關係等層面的自我賦能。作者通過分析「媒介使用」、「多線勞動」、「虛

擬社區」等實踐形式，揭示了勞動者如何借助數字技術實現自我賦權、規避監控甚至組織集體抵抗。這一視角呼應了布洛維 (Michael Burawoy) 對工人主體性的關注，但遺憾的是，作者未能指出相較於工廠時代工人的主體性來自於生產實踐，平台經濟中勞動者的主體性來自於何方。

文章的現實意義在於通過「另類數字實踐」揭示出平台經濟中勞動者的韌性生存策略，而這一點是被現有研究所忽視的。作者之所以將這一概念定義為「另類數字實踐」，是因為它是在完成訂單的工作系統之外的媒介使用和實踐，但是一般的「數字實踐」與「勞動者會積極捕捉算法漏洞，規避算法監控，展開豐富的『逆平台』和『逆算法』實踐」之間的區別和聯繫，有待於作者進一步釐清。

此外，文章對新媒介的使用效應的討論稍顯單薄。例如，作者認為勞動者通過在抖音、快手等新媒體上講述自己的經歷和感受等吸引流量，並將其轉化為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從而實現其自我賦權和集體性反抗。不可否認，一小部分平台勞動者確實嘗到流量帶來的紅利，但並非所有勞動者都能如願，即便是嘗到新媒體使用「甜頭」的勞動者，也會為了持續不斷的流量變現而被內容平台的算法機制所「捆綁」。他們不僅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在直播或短視頻平台上，而且需要製作能夠製造情緒、吸引流量甚至是虛假的內

容。此外，內容平台的算法推薦機制也可能加劇平台勞動者的信息繭房，使其陷入單一的認知和更隱蔽的控制之中。

趙磊 北京

2025.5.14

在平衡與失衡之間

數字化到底對中國的勞動關係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這成為當前政府治理勞動關係面臨的最大困境之一。汪建華〈數字化與中國用工關係的演變趨勢〉(《二十一世紀》2025年4月號)一文抽絲剝繭地梳理了前數字化時代和數字化時代兩個階段，中國靈活用工演變的脈絡，並對其發展趨勢進行前瞻性的判斷。

汪文為我們呈現了兩條重要的線索：一是對靈活用工方式出現的歷史淵源進行追溯，分析了工業化背景下的勞動保障如何被全球化的資本策略所打破，以及數字化如何加劇了靈活用工方式的持續和拓展。工業化生產所衍生的勞動保障土壤隨着資本轉移和競次現象的出現而式微，靈活用工隨之崛起。政府為了平衡資本的無序擴張，構建勞動法律制度以治理靈活化的勞動關係。但是，這種平衡很快被基於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商業模式打破，勞動的數字化將固定空間的大生產模式轉化為虛擬空間結合社會空間，更多靈活用工方式湧現。

二是靈活用工方式的衍生效應或曰擴張效應。作者不僅觀察到平台經濟的構成在數字技術的驅動下變得更加靈活，靈活用工在不同行業中形

成規模，更敏銳地洞悉了「平台運營支撐型靈活用工」的擴散，反映出資本一個重要的經營邏輯——組合市場要素經營思維，如「共享用工」和「個體工商戶」。

誠然，兩條線索清晰且深刻，引導我們對當前勞動關係治理的困境產生更加清晰的認識。2021年以來，黨和政府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問題愈加重視，並發布了多項政策。然而當前治理方式既無法完全跨越傳統勞動關係規制的制度體系，也無法形成對數字經濟下靈活用工方式的強制性規範，在嵌入和脫離勞動制度之間不斷拉扯、在兜底保障和單項權益之間尋求耦合、在就業數量和就業質量之間形成妥協。這既體現出靈活用工生態對傳統治理方式的挑戰，也反映了外部經濟社會條件的限制。

勞動關係的一個永恆話題是如何通過平衡的機制治理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失衡問題。去勞動關係化帶來的低勞動保障水平和缺乏穩定的工作機會，給勞動者群體帶來的不確定性具有長期效應。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失衡更多表現在靈活用工方式下勞動者對平台規則的不滿、對收入不穩定的擔憂、不公正待遇和缺乏職業安全健康保障的爭議，以及因「單價」調低而出現的集體行動。因此，這些失衡問題的解決方法，只能是針對勞動者權益狀況制定新的法律制度，以及完善勞動者和平台及其合作商的溝通機制。前者為了構建有序的靈活用工關係，後者則為促進勞資和諧的關係。

孟泉 北京

2025.5.15